

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影响及其代际差异

章洵¹, 陈宁², 石人炳²

(1. 江汉大学法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56; 2.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 基于 2014 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 分析了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结果表明: 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并不强烈, 只有 42% 的第一代农民工和 48% 的新生代农民工愿意落户城市; 劳动报酬对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具有提升作用, 但对第一代农民工影响不显著; 无论是第一代农民工还是新生代农民工, 加入工会、参与培训、职业地位等对其城市落户意愿具有正向影响, 超时劳动、签订合同等具有负向影响; 不同社会保障的影响程度存在代际差异, 拥有养老、医疗保险的第一代农民工城市落户的可能性更大, 拥有失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落户的可能性更大。

关键词: 农民工; 就业质量; 城市落户意愿; 代际差异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8)01-0061-06

Influence of employment quality on household inten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heir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ZHANG Xun¹, CHEN Ning², SHI Renbing²

(1. Law School Jiang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56; 2.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Huazh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Science, Wuhan 430074)

Abstract: This paper utilizes the dynamic monitoring data of floating population from National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in 2014,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employment quality on migrant workers' household intention and their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only 42% of the first-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and 48%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re willing to have their household registration converted,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majority are reluctant to do so. The payment has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migrant workers while exerting little influence on the first-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Both of them are obviously positively influenced by the participation of union, training attending and career position. On the contrary, the work load and contract signing conspicuously hinder them. The degree of influence of different social insurance demonstrates generation difference. To put it differently, the first-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who possess pension and medical insurances and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who have unemployment insurance and housing fund are likely to transfer their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s a consequence, the improvement of migrant workers' employment quality is the indispensable policy to push forward the citizen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Keywords: migrant workers; employment quality; household intention;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 由于农民工难以获得城市户籍, 他

们不得不在城乡之间徘徊, 处于“半城市化”状态。近年来, 国家逐步放宽中小城市户籍限制,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力争到 2020 年实现 1 亿农业户籍人口进城落户^①。然而, 截至 2016 年底, 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57.35%, 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却只有 41.2%。这意味着仍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工虽然实现了从农业到非农的就业转变, 却未能实现从农民向市民的身份转换。在诸多城镇推出宽

收稿日期: 2018 - 01 - 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6BRK030); 江汉大学 2016 年度科研启动费(1002-06880002)

作者简介: 章洵(1982—), 女, 湖北天门人, 博士, 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迁移与城市化。

松落户的政策背景下,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却依旧不强,可见他们是否落户城市不仅受户籍制度约束,还可能受到诸多结构性要素的影响^[1]。因此,对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进行考察,挖掘其“进城不落户”背后的深层原因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探讨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关于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的影响因素,学界进行了诸多研究,大体可分为四类:其一是收入、消费及住房等经济方面的影响因素。推拉理论认为劳动力迁移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导致的地区间劳动力供需差异造成的,“二元结构”模型论证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通常会导致城市与农村在工资水平上的差异,从而使农村劳动力迁入城市。安默特、克拉克、梅西等在经典迁移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财产、收入、住房价格和消费等对农村劳动力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2-4]。黄乾、秦立建、罗丞等研究发现劳动报酬、住房状况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5-7]。其二是户籍、社会保障以及土地制度等方面的影响因素。黄锟研究发现就业行业、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具有显著影响^[8]。王桂新、秦立建等分析了农民工土地权益和社会保障状况对其城市落户意愿的影响,发现农地权益越少、社会保障状况越好,其城市落户意愿越强^[9-10]。其三是人力和社会资本等方面的影响因素。石人炳、陈昭玖等认为,以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培训为表征的教育和技能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教育程度高、参加过职业培训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较强^[11-12]。陈延秋等认为,在流入地有同学、亲戚以及参加经常社会组织活动的农民工更倾向于落户城市^[13]。其四是社会特征方面的影响因素。李楠、夏怡然、王玉君等研究认为,与子女同住、有效的社会融入以及城市归属感等因素对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具有重要影响^[14-16]。此外,也有研究关注到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的影响。就业质量不仅关系到农民工的生存境遇和生活质量,而且也可能影响到其与城市居民的社会互动和对城市的认同,进而影响到他们的落户意愿。如聂伟等利用珠三角和长三角的调查数据探讨了就业质量和社会交往对农民工城市入户的影响^[17];罗恩立、石智雷等分别从就业能力、工作时间等维度考察了农民工的城市落户意愿^[18-19]。

纵观已有研究文献,仍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

从就业质量视角出发对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进行研究的文献不多,仅有的文献要么是利用区域性调查数据,要么对就业质量的指标体系缺乏综合性的考量;二是对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的代际差异缺乏研究。鉴此,笔者拟利用2014年全国性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考察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为制定相关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提供借鉴。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和模型选择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国家卫生计生委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此次调查主要采用分层、多阶段及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抽样方式。调查对象为本地居住一个月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年龄在15~59岁的流动人口。调查内容主要包括流动人口的个体特征、就业状况、社会保障、社会融合等,对分析本研究的问题具有代表性。按照研究目的,重点筛选“户口性质为农业,就业身份为雇员的流动人口样本”。剔除所选分析变量中有缺失值的样本,最终得到有效样本量8569个,其中第一代农民工2740人,新生代农民工5829人。

2. 变量选择

被解释变量为城市落户意愿。在问卷中,选取“若没有任何限制,您是否愿意把户口迁入本地”的问题测量农民工的落户意愿。将回答是的赋值为1,表示愿意落户城市,将选择否的赋值为0,表示不愿意落户城市。最终落户意愿为二分类变量。

就业质量是反映整个就业过程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并取得报酬或收入的具体状况之优劣程度的综合性范畴^[21]。目前理论界广泛认同的就业质量框架主要包括工作机会、工作自由、生产性工作、工作尊严、工作平等和工作保护等六个维度^[20]。它是综合反映劳动者就业状态的指标,虽然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和衡量标准,但基本上都是围绕就业报酬、工作时间、就业培训、就业保护、劳资关系、工作环境、职业发展等方面展开^[22-23]。依据以往研究,本研究将核心解释变量分成五个维度。分别从被调查农民工的劳动报酬、劳动时间、劳资关系、工作保护和职业发展来测量就业质量。

为尽量消除变量遗漏带来的估计偏差,引入相关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婚姻、受教育程度等个体特征;打工地购房状况、家中土地数等家

庭特征 ;本地工作时间、工作城市规模等流动特征。
变量定义和样本特征见表 1 :

表 1 变量定义及样本特征

指标	变量	定义	第一代 农民工	新生代 农民工
工作报酬	月收入/元	连续变量	3 271.04	3 241.5
劳动时间	周均工作超过 5天	否=0	16.57	22.18
		是=1	83.43	77.82
劳资关系	加入工会	否=0	89.05	89.33
		是=1	10.95	10.67
	签订劳动合同	否=0	33.58	32.13
		是=1	66.42	67.87
工作保护	养老保险	否=0	62.36	64.57
		是=1	37.62	35.43
	医疗保险	否=0	64.23	65.72
		是=1	35.77	34.28
	失业保险	否=0	70.5	69.26
		是=1	29.5	30.74
住房公积金	否=0	91.86	89.18	
职业发展	参加培训	否=0	75.28	70.14
		是=1	24.72	29.86
	职业类型	普工=0	92.61	88.52
		专业技术人员=1	6.34	9.97
管理人员=2		1.05	1.51	
控制变量	性别	女=0	42.04	47.1
		男=1	57.96	52.9
婚姻状况		未婚=0	5.04	51.59
		已婚=1	94.96	48.41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0	21.93	3.16
		初中=1	59.20	50.04
		高中=2	15.73	30.69
		专科及以上=3	3.14	16.11
土地/公顷	连续变量	0.26	0.3	
购房		否=0	91.04	93.98
		是=1	8.96	6.02
连续工作年限	连续变量	5.45	2.68	
城市规模		特大城市=0	18.21	22.77
		省会城市=1	20.22	28.07
		一般城市=3	61.57	49.16

注 :表中连续变量报告的是均值,分类变量报告的是百分比;城市规模中特大城市指“北上广深”等四大城市,省会大城市指其他的省会城市;一般城市指除特大城市和省会城市之外的城市。

从就业质量来看,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存在一定差异。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月收入基本持平,但第一代农民工每周平均工作时间明显超过新生代农民工,84%的第一代农民工和77%的新生代农民工存在超时劳动的情况;新生代农民工相比第一代农民工更注重劳资关系和就业权益,其签订劳动合同、拥有社会保障的比例明显高于第一代农民工;从职业发展特征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从事管理和专业技术工作的比例均高于第一代农民工。

从个体特征来看,第一代农民工中男性占比为

57.96%,女性占比为 42.04%,新生代农民工中男性占比为 52.9%,女性占比为 47.1%;就婚姻而言,第一代农民工已婚比例为 95.61%,新生代农民工已婚比例为 48.41%;教育程度方面,第一代农民工中高中及以上学历占比 18.87%,新生代农民工中高中及以上学历占比 46.8%,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第一代农民工。

从家庭特征来看,第一代农民工平均拥有 0.26 公顷土地,第二代农民工平均拥有 0.3 公顷土地。新生代农民工拥有土地明显高于第一代农民工,可能原因是第一代农民工由于年龄渐长以及子代成家将大部分土地分到子代名下。在购房特征方面,第一代农民工中已经购房的占比为 8.96%,第二代农民工已经购房的占比为 6.02%。

从流动特征来看,第一代农民工在所调查城市连续工作时间平均为 5.45 年,新生代农民在所调查城市连续工作时间平均为 2.68 年;就城市规模而言,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和省会等大城市。第一代农民工在特大城市以及省会城市中的比例约为 38.43%,明显低于新生代农民工的 50.84%。

3. 模型选择

本研究因变量“户籍身份转换”是二向性问题,故使用的计量模型是基于个体层面的二元 Logit 模型。农民工个体选择愿意的概率由以下回归方程决定:

$$\text{Logit}(p) = \alpha + \sum \beta_i x_i + \varepsilon \quad (1)$$

根据 Logit 的定义,变换操作之后有:

$$\text{Logit}(p) = \ln\left(\frac{p}{1-p}\right) \quad (2)$$

在式(1)和式(2)中, p 表示农民工愿意城市落户的概率; $1-p$ 表示不愿意城市落户的概率; $p/(1-p)$ 为事件发生比,简称为 odds; x_i 表示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的影响因素; β_i 表示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 α 为截距项; ε 为残差项。

另外,为达到研究目的,对比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城镇落户意愿的区别,特别针对两组群体分别建模,以探析就业质量对两代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影响的差别。

三、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总体而言,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不够强烈,愿意落户的农民工仅占总体的 45.8% (表 2)。进一步从代际比较来看,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近 48%的新生代农民工愿意将户口迁入城市,约 42%的第一代农民工愿意落户城市。可见,相较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较强

的城市移民倾向,更愿意落户城市(表2)。

表2 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分布

类别		愿意	不愿意	合计
全样本	频次	3 924	4 645	8 569
	百分比/%	45.8	54.2	100
第一代农民工	频次	1 143	1 597	2 740
	百分比/%	41.72	58.28	100
新生代农民工	频次	2 781	3 048	5 829
	百分比/%	47.71	52.29	100

就业质量影响农民工城市落户的回归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模型1和模型3检验了控制变量对落户意愿的影响,模型2和模型4在控制变量基础上检验了就业质量的净效应。模型1、模型2的解释系数小于模型3、模型4的解释系数,说明影响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的因素存在差异。下文将对影响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的机制进行解析。

表3 就业质量与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的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	第一代农民工(Exp)		新生代农民工(Exp)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性别(女=0)	1.181***	1.222***	0.97	0.93
婚姻(未婚=0)	0.923**	0.936*	1.141**	1.129**
教育程度(小学=0)				
初中	1.281*	1.247*	1.23	1.227
高中	1.595***	1.484***	1.722**	1.701**
大学专科及以上	2.255**	2.048**	2.179***	2.019***
土地数量	0.894**	0.872**	0.933*	0.901*
购房(否=0)	2.095***	2.105***	1.744***	1.668***
连续工作年限	1.209***	1.025**	1.076***	1.073***
城市规模(一般=0)				
省会城市	1.533***	1.561***	1.644***	1.618***
特大城市	2.265***	2.263***	2.295***	2.275***
月收入对数		1.021		1.228***
周均超过5天(否=0)		0.73**		0.805***
加入工会(否=0)		1.125**		1.541**
签订合同(否=0)		0.792***		0.803***
职工养老保险(否=0)		1.243***		1.479***
职工医疗保险(否=0)		1.303***		1.125*
职工失业保险(否=0)		1.137***		1.204***
住房公积金(否=0)		1.239**		1.716***
参加培训(否=0)		1.314***		1.355***
职业类型(普工=0)				
专业技术人员		1.052**		1.142**
管理人员		1.116**		1.274**
N	2 740	2 740	5 829	5 829
R ²	0.078	0.114	0.085	0.127

注: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模型1表明劳动报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落户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第一代农民工的影响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这与一般认识存在差异,可能原因是大部分第一代农民工进城的主要目的是“挣钱”,虽然城市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城乡收入差距依旧未减,在城市高房价、高消费的巨大生活压力下,第一代农民工并不倾向于落户城市。而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较高的劳动报酬,意味着其具备了作为城市居民的职业能力和在城市生活的经

济能力,有助于实现从农民工到市民的转变。

模型2反映了劳动时间对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有显著影响,长期超时劳动显著降低了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以周均工作时间5天为参照,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中超时劳动的城市落户意愿仅分别是未超时劳动的0.73倍和0.805倍。尤其是第一代农民工由于年龄较大,身体机能弱化,对长期加班更为排斥。在城市就业面临“同工不同酬”的现实境况下,农民工一般通过“自愿加班”来获

取更多的劳动报酬,但是长时间超负荷劳动,意味着更少的休息和闲暇时间,导致他们产生身心疲劳感,难以去享受城市生活,从而降低了两代农民工的城市落户意愿。

模型 3 表明无论是第一代农民工还是新生代农民工,加入工会对其落户意愿都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中加入工会者的城市落户意愿分别是未加入工会的 1.125 倍和 1.541 倍。农民工加入工会有助于将其“组织化”,可以借助组织力量维护“底线”劳动权益,保障工作福祉,进而提升城市认同感,增强城市落户意愿。值得注意的是,签订劳动合同降低了两代农民工的城市落户意愿,这与通常的认知不符。一般认为,签订劳动合同有助于保障劳动者权益,稳定工作关系,但由于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弱势,不得不接受各种不平等的合同条款,使得“权益保障合同”异化为“责任转嫁合同”。进一步分析发现,农民工签订的劳动合同绝大部分属于短期和无固定期限合同,无法带来稳定的职业发展预期和职业安全感。这也说明应该加强劳动监察,增强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谈判地位,提高签订合同的有效性和公平性。

是否享受企业提供的就业保护是衡量就业质量的重要维度,关系到农民工在城市抵御疾病、养老、失业等风险的能力。通过模型 4 可以看出,拥有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是不同类型的保险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对第一代农民工而言,养老和医疗保险对其城市落户意愿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养老、医疗问题对第一代农民具有现实紧迫性。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养老保险对其城市落户意愿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而医疗保险仅在 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可能原因是城市养老保险待遇水平远高于农村养老保险,对规避未来养老风险具有重要作用。而就医疗保险而言,一方面医疗保险往往只报销住院治疗费用而不报销门诊支出,同时城镇地区医疗费用较高;另一方面外出的新生代农民工本身存在“健康选择效应”,身体状况往往较好,所以医疗保险的影响效应相对较小。

同时,本研究关注了以往较少考虑的失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对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的影响。研究

发现,失业保险对两代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均具有显著影响。农民工就业大多集中于稳定性较差的次级劳动力市场,随时面临失业风险,如果能够通过失业保险有效规避失业风险,为农民工提供失业期间的生活保障,则可以显著提高其城市落户意愿。住房公积金对两代农民工的城市落户意愿具有促进作用,并且对新生代农民具有更为显著的影响。农民工进城落户无疑要建立在“安居乐业”的基础之上,而住房公积金则是当前高房价背景下帮助农民工实现安居梦的重要政策抓手。

模型 4 显示接受过技能培训的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落户的可能性分别是没有接受过培训的农民工的 1.314 倍和 1.355 倍。这表明接受职业技能培训可以显著提高农民工的城市落户意愿。可能原因是技能培训可以增强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提高其预期收益,进而提升其城市落户意愿;从职业地位来看,职业地位越高城市落户意愿越强。与普通工人相比,农民工中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城市落户意愿更强。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考察了就业质量对两代农民工落户意愿的影响及差异,结论如下:

第一,总体而言,在城市户籍制度逐步放开的背景下,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并不十分强烈,只有 45.8% 农民工愿意落户城市,54.2% 的农民工不愿意放弃农村户口。从代际差异来看,有 42% 的第一代农民工和 48% 的新生代农民工愿意落户城市,新生代农民工愿意落户城市的比例较高。第二,就业质量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城市落户意愿,就业质量越高,农民工城市落户的可能性越大。劳动报酬对新生代农民工落户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第一代农民工虽有正向影响但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加入工会的组织保障、良好的培训和较高的职业地位等对两代农民工城市落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超时的劳动时间、签订劳动合同对两代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社会保障对农民工落户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但不同类型的保险对不同代际农民工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拥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第一代农民工愿意落户的可能性更大;拥有失业保

险和住房公积金的新生代农民工愿意落户的可能性更大。

本文结论可得出如下政策含义：

首先，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推进就业机会和就业服务均等化。劳动力市场分割是农民工城市就业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要消除城市就业体制中存在的准入壁垒、户籍保护和就业歧视，打破体制和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释放优质行业就业空间，确保城乡劳动力享有均等的就业机会和就业服务，为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其次，加强劳动监管和企业工会组织建设，保障农民工合法劳动权益。加强劳动监管和劳动保护法律法规的落实，完善农民工工资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不断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加强私营企业的工会组织建设，引导农民工加入工会，提高广大农民工同企业平等协商的能力。劳动监察部门要重点规范企业用工行为，确保劳动合同签订的公平性、劳动时间的适度性和工作条件的安全性，及时处理农民工维权事宜，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劳动权益不受侵害。

再次，着力提高农民工社会保障参保率，重点扩大失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让“社会保障”真正代替“土地保障”。一方面政府主管部门要监管和宣传双管齐下，提高农民工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参保率；另一方面要逐步破除社会保障权益的区域分割，提高农村养老保险待遇，稳步推进覆盖全体居民的一元化社会保障制度进程。同时，重点推进新生代农民工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参与，支持新生代农民工借助住房公积金购买住房。

最后，推进职业培训常态化，构建农民工职业技能认证体系。通过加大财政投入，建立农民工常态化职业培训机制，不断提升其人力资本，增强城市就业能力。同时，针对农民工“技术流动的社会断裂”困境，建立和推行农民工职业技能认证制度体系，通过官方渠道确立其技术身份，实现人力资本积累，以此提升其职业地位和社会地位^[24]。从一定意义上说，构建农民工职业技能认证体系，是从职业发展角度推动农民工进城落户的制度前提。

注释：

① 引自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

参考文献：

- [1] 王晓峰, 温馨. 劳动权益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J]. 人口学刊, 2017(1): 38-48.
- [2] Amott R. Economic Theory and housing[J]. 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 1987(2): 959-988.
- [3] Clark W. Tenure changes in the context of micro-level family and macro-level economic shifts[J]. Urban Studies, 1994(1): 137-154.
- [4] Massey D S. Immigrant Intentions and mobility in a global economy: The attitudes and behavior of recently arrived US immigrants[J].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2006(5): 954-971.
- [5] 黄乾. 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的影响因素[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8(4): 21-27.
- [6] 秦立建, 王震. 农民工城镇户籍转换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人口科学, 2014(5): 99-106.
- [7] 罗丞. 安居方能乐业: 居住类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研究[J]. 西北人口, 2017(2): 105-114.
- [8] 黄锟. 城乡二元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的实证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3): 76-81.
- [9] 王桂新, 胡健. 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与市民化意愿[J]. 人口学刊, 2015(6): 45-55.
- [10] 秦立建. 农地收益、社会保障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J]. 农村经济, 2017(1): 79-85.
- [11] 石人炳, 陈宁. 经济新常态下农民工再迁移决策研究[J]. 学习与实践, 2017(7): 98-108.
- [12] 陈昭玖, 胡雯. 人力资本、地缘特征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J]. 农业技术经济, 2016(1): 37-47.
- [13] 陈延秋, 金晓彤.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 西北人口, 2014(4): 105-111.
- [14] 李楠. 农村外出劳动力留城与返乡意愿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人口科学, 2010(6): 102-108.
- [15] 夏怡然. 农民工定居地选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10(3): 35-44.
- [16] 王玉君. 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研究[J]. 人口研究, 2013(4): 19-32.
- [17] 聂伟, 风笑天. 就业质量、社会交往与农民工入户意愿[J]. 农业经济问题, 2016(6): 34-42.
- [18] 罗恩立. 就业能力对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J]. 城市问题, 2012(7): 96-102.
- [19] 石智雷. 工作时间、业余生活与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5(4): 12-21.
- [20] 马继迁, 张宏如. 就业质量的代际差异[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6): 200-204.
- [21] 张昱, 杨彩云. 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分析[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5): 9-20.
- [22] 赖德胜. 中国各地区就业质量测算与评价[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1(11): 88-99.
- [23] 张抗私, 盈帅. 性别如何影响就业质量[J]. 财经问题研究, 2012(3): 83-90.
- [24] 李强. 非正规就业视角下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J]. 城市问题, 2016(1): 99-103.

责任编辑: 曾凡盛